



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庐陵文章耀千古

JU LING WEN ZHANG YAO QIAN

刘文源 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庐陵文章耀千古

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刘文源 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名：庐陵文章耀千古
作者：刘文源编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17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南昌市凌云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5.375
字数：38万
版次：199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8.50元
ISBN 7-80647-170-7/I·126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杜维沫 陈 新

1997年10月,为纪念欧阳修诞辰990周年、逝世925周年,由吉安师专、永丰县人民政府、吉安地区文化局、吉安地区名人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宋史研究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联合发起,并由吉安师专具体组织,在欧阳修的故乡江西吉安,召开了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不少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这个集子中收集的,即是参加会议的学者所提交的优秀论文。

我们研究古人,当然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搞庸俗的所谓“古为今用”,如多年前大搞所谓“儒法斗争”之时,为了抬举柳宗元,就把韩愈树为对立面,为了抬举王安石,就把欧阳修树为对立面,不顾历史实际,任意牵强附会。这其实是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附庸,在当时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事过境迁,不过成为笑柄。今天我们研究历史事态、历史人物,包括对欧阳修的研究,仍应把这作为反面教材,吸取教训,同时要提倡全面掌握有关资料,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端正方向,有益于中华民族光辉文化传统的弘扬,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生活在北宋的欧阳修,不仅是一代文宗、宋学的开创者,而且是卓越的政治家。他的精神风貌、思想品质、立身处世,都不愧为一个正直敢言、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人。这里,拟着

重从这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欧阳修景仰唐代的韩愈，早年曾仿效韩愈的《杂说四首》写了《杂说三首》，抒发他的人生理想。第一首强调要有为而发，不作无病呻吟；第二首强调要建功立业，不追求功名利禄；第三首强调要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但欧阳修对韩愈亦非盲目崇拜。仁宗景祐三年（1036）他被贬为夷陵令时，作《读李翱文》，其中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不久，作《与尹师鲁书》，其中说：“又常与安道（余靖）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愈）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这两段话便是对韩愈在《二鸟赋》中所表现的忧虑个人得失，及其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后所写的“欢戚无异庸人”的文字，进行批评，并以此作为自己和同志的鉴戒。

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成进士后，初任西京留守推官。明道元年（1032）在洛阳营其办事处所西偏为堂，名之曰“非非堂”，并作《非非堂记》以自励。这篇记文虽仅有二百余字，却是我们研究欧阳修一生立身处世准则的一篇重要文章。

是非标准，实际即道德标准，虽然各个时代标准会有所不同，总得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孟子曾说过：“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可是无论哪个时代，在一般情况下，是其所是，即肯定人的正确，不会有不良后果，非其所非，即指出人的错误，特别是指出当权者的错误，往往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被视为恶意攻击，遭受迫害。然而欧阳修这篇《非非堂记》的主旨，正在于阐明非其所非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夫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也。”这种认识为他始终所身体力行，可谓言行如一，无所畏惧，因此屡遭颠沛，但他百折不悔。

辨政事之是非，言朝廷之得失，是谏官的职责所在，所以欧阳修十分重视谏职，对谏官有很高的要求。谏官，亦称言官，是我国历史上特有的官制。秦代即有谏议大夫，以后各朝称谓不一。《宋史·职官志》云：“（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谏官在宋代官阶虽不高，却可直接向皇帝建言，责任重大。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由陈州通判召为右司谏，欧阳修遂在洛阳作《上范司谏书》加以切责。书中首先指出：“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以陈昌言，以塞重望。”足见他对范仲淹作为谏官能向朝廷直言“天下之得失”并有所作为的期望之殷。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官权知开封府，因言事与宰相吕夷简发生矛盾，贬知饶州。当范仲淹被贬时，朝臣纷纷论救，而左司谏高若讷独喑默不言，并在余靖家诋毁范仲淹。此时欧阳修在京任馆阁校勘，即作《与高司谏书》，义愤填膺地写道：“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唯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尹洙）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范仲淹）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高若讷接到此书后，恼羞成怒，不但将此书上交朝廷，并且向朝廷指控书中议论“恐中外闻之，谓天子以廷意逐贤人，所损不细”，欧阳修因此被贬为夷陵令。

庆历三年（1043），仁宗为要扩大言路，增置谏官，任命欧阳修、王素、蔡襄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欧阳修任谏官，史称“论事切

用以爱农”的主张，实行“宽简”的政治，希望与民休息，安定社会，以有利于增进国力。皇祐二年(1050)知应天府时，他在所作《与田元均论财计书》中曾论及改革弊政的困难，说：“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无沮改，则实难；裁冗长、塞侥幸非难，然欲其能久而无怨谤，则不易。为大计既迟久而莫待，收细碎又无益而徒劳。”嘉祐四年(1059)在京城开封纂修《唐书》时作《秋声赋》名篇，其中有“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句。嘉祐八年(1063)在参知政事任上作《夜宿中书东阁》诗，其中又有“忧心国事百箭攻”之句，这些都反映了他忧国忧民情怀的深切和他遭受挫折而不改素志的苦痛、矛盾心态。

英宗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 61 岁。从这年起他多次上表请求退休，但直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才得到朝廷准许。治平四年他在作《归田录序》时，抚今追昔，更是不胜感慨，写道：“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指嘉祐五年任枢密副使始)。……盖方其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费大农(国库)之钱，为太仓(国家粮仓)之鼠也。”这种勇于自责、不居功自傲、不贪恋禄位的精神，无论古人今人，都是难能可贵的。

神宗即位后用王安石为相，大力推行新法。王安石是欧阳修极为赏识的人才，曾多次向朝廷加以推荐。熙宁三年，欧阳修在知青州任上，见到由王安石主持制定的青苗法推行过程中有强迫农户借贷青苗钱(即所谓“抑配”)等情况，致使本为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按需贷款助民的惠政变成由官府普遍向农户硬性“放债取利”的弊政，因而他便向朝廷上《言青苗钱札子》，详细分析了产生“抑配”现象的原因，并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对青苗法的批评性意见和正面的改进建议。这显然不能看作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也不能看作是“思想保守”，所以，近代很推崇王安石的思想家梁启超在所著《王安石评传》中早就明确指出：欧阳修能积极揭露青苗法所

定条款的缺陷及推行中所出现的弊病，同时能积极提出改进建议，直言不讳，无所顾忌，实乃王安石之“诤臣”。

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在退居地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病逝，未能见到王安石新法全面推行的情况。王安石对欧阳修一生始终正直敢言、不计个人利害的优良品德是十分钦敬的，他在所作《祭欧阳文忠公文》中满含激情地赞叹道：“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遭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宋史》本传总评欧阳修的个性及一生行事之风范说：“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这些评论，今天看来依然异常公允，绝非溢美之辞。

欧阳修一生的著作，除政事文字外，涉及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等，方面众多，内容丰富，成就非凡，可谓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其精华部分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却很不够。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在吉安的召开，以及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无疑是将欧阳修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也可以说是“欧学”开始建立的起点。希望今后关于“欧学”的学术讨论会能够定期举行，使“欧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99年3月于北京

(本文两位作者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专家委员会委员)

写在《庐陵文章耀千古》出版之际

李国强

欧阳修是我所崇拜的历史人物。

早在幼年时期，欧阳修“画荻学书”的故事，就如同“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一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学时代，语文教科书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名篇，令我陶醉，油然而生敬意。上大学时，我又粗粗涉猎过他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对欧阳修的生平和事业有些大致的了解。

1979年，我在写作《历代名人与庐山》一书时，特地查找欧阳修在庐山的活动资料，写了一篇《欧阳修与庐山》的文章，主要论述欧阳修的长诗《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和他送《泷冈阡表》回永丰途中，碑沉鄱湖，龙神读表的传说。这便是我对欧阳修最初的研究。“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1984年夏，到湖北宜昌（古夷陵）出差，我顺道寻觅过欧阳修在夷陵的遗迹，对他贬官夷陵的生活思想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并萌发了造访欧阳修故里的念头。

欧阳修的故里在永丰县沙溪镇，古属庐陵，所以他自称为“庐陵欧阳修”。1997年10月，在欧阳修诞辰990周年的时候，吉安师范专科学校和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欧阳修首次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甚多，本是学习、研究欧阳

修，并考察其故居的极好机会，但我因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而失之交臂。一年后，又一位庐陵人杨万里的全国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吉安师专召开，我借与会之机，抽空到永丰县，参观了欧阳修纪念馆和沙溪镇，总算是却一桩夙愿。

时易岁迁。从我写《欧阳修与庐山》到今天，转眼就是 20 年。在沙溪镇修葺一新的西阳宫内，我抚碑细读《泷冈阡表》这篇千古至文，虽然没有发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处的龙爪痕迹，但其非凡的艺术魅力，仍然再次震撼了我的心灵。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伟大人物，从“画荻学书”到《泷冈阡表》，欧阳修不就是我们民族古老传统文化造就的一代精英吗？

的确，欧阳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集文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诗人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是不朽的。无疑，这样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学术“富矿”，值得后人不懈地学习、研究、宣传和纪念。

作为政治家，欧阳修具有改革精神，讲是非，重人格。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参知政事，位显权重，但他关注国家时局和人民疾苦，敢于革新，“庆历新政”就是他与范仲淹等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政治历史遗产。他历经诸多磨难，性格刚正，敢怒敢言，敢于作为。即使身处逆境，负谤遭谪，也能超然物外，“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表明了他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王安石说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是符合实际的评价。尤为可贵的是，他乐于敢于和善于奖引和荐拔人才，如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都曾受到他的奖掖和提携，在中国政坛留下佳话。

作为学者，欧阳修具有创新精神，学识广，治学严，在诸多领域卓然成家。他倡导古文，力矫“西昆”，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一生著述 22 种，仅《四库全书》就收录或存目 13 种。一部二十四史，他独占两部。苏轼评其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诗赋似李白”，实为公论。晚年，他仍一丝不苟，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稿。他的夫人劝阻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呢？还怕先生骂么？”他说：“不是怕先生骂，而是怕后生笑。”这件事传为文坛美谈。

作为赣籍人士，欧阳修深爱故里，怀故土，思故乡。欧阳修 47 岁时，扶护母亲灵柩归葬沙溪。下葬之日，他指着泷冈，对身边的亲友说：“此处他日葬老夫。”此后，他曾七八次向朝廷请求，回洪州（今南昌）任职，未能如愿。他的诗“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等，表明了他对故乡的热爱。他最后病逝颍州，虽葬于新郑，但他的思想、人格和他留下的大量作品，却是故乡和后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宝贵精神财富。

江西人对欧阳修这位先贤表现了诚挚的崇敬和拥戴之情。明代，星子县就立有欧阳修的《庐山高》诗碑。王守仁在庐山大天池手书的《庐山高》诗，被刻于九十九盘道的石壁上，旁边建有“庐山高”石坊。这座石坊，曾毁于日寇之手，今又重建。《庐山高》是欧阳修生前自我感觉最好的诗，自然也是近千年来的辉煌庐山的佳作之一。在南昌、吉安等地，至今仍有以欧阳修的名字命名的“永叔路”。在永丰县城，近年建有规模宏大的欧阳修公园和纪念馆，并塑有欧阳修花冈岩全身巨型雕像。在沙溪镇的南凤凰山，欧阳修父母的合葬墓及他两位夫人的墓，至今保存完好。

1998 年，我去沙溪瞻仰时，序属三秋，在凤凰山平缓的坡地

上，遍地盛开着白艳艳的山茶花，墓地四周静谧而肃穆。我不禁想起，前年参加欧阳修学术讨论会的上百位代表来此参观时，也是三秋时节，茶树正值花期。年年岁岁，这满山遍野白花簇拥的情景，如滚滚浪潮，不正象征着欧阳修之对父母、后人之对欧阳修的不尽思念吗？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在吉安召开，也是这份情结的反映。现在讨论会论文以《庐陵文章耀千古》为书名结集出版，主持者约我写几句话，我不便推脱，拉杂写来，算是一位追思者为先贤献上的一瓣心香吧。

1999年5月1日于南昌镂石斋

(本文作者为江西省社科院
院长、党组书记、研究员)

目录

序	杜维沫 陈 新(1)
写在《庐陵文章耀千古》出版之际	李国强(7)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吴怀祺(1)
略谈永叔《易》理	刘仁衍(20)
欧阳修的君子意识	陈晓芬(33)
欧阳修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论略 …	陈 浩 顾奎相(46)
欧阳修的创“新”与辟“怪”	刘德清(63)
欧阳修的王道理论与富国强兵思想	李卫东(76)
择吏为先 择贤而举	
——简论欧阳修的吏治观	周承忠(86)
欧阳修与《朋党论》	曾扬华(92)
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	莫砺锋(100)
欧阳修的主盟历程	洪本健(114)
“文章太守”的文论架构	
——欧阳修文论的渊源、成就及影响	王守国 卫绍生(129)
欧阳修双重文学观评议	徐培均(142)
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	曾子鲁(151)

试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	王齐洲(163)
从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看欧阳修	
革新传统散文的理论贡献	刘衍(172)
韩、欧古文摭论	蔡世明(180)
平淡典要 粹金如玉	
——论欧阳修的散文	张清华(196)
欧阳修序文简论	潘友梅(216)
简论欧阳修委曲婉转的散文风格	陈必祥(227)
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	
——试论欧阳修散文的特色	周本淳(235)
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	严杰(245)
欧阳修诗歌两首考异	陈光崇(260)
试论欧阳修七言古风之得失	胡迎建(267)
欧阳修词蕴势刍议	张家鹏(280)
欧阳修词的创作分期及风格嬗变	龙建国 杜道群(288)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试论欧词“侧艳”形成的内因	孙兰廷(298)
为欧阳修词一辩	杨有山 傅瑛(307)
欧阳修文学作品在国外	王丽娜(319)
欧阳修诗文拾遗	刘文源(338)
欧阳修作品中的山意象	梁德林(344)
欧阳修的语用观	康家珑(352)
论欧阳修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美学思想	张承龙(359)
欧阳修的书论和书艺	胡源(369)
试论欧阳修对史学的贡献	邓瑞(379)
欧阳修的文史成就	
——兼论《新五代史》的有关问题	
.....	杨昶 姚伟钧 王玉德(392)

评欧阳修“止散青苗钱”问题

——兼论王安石新法中之青苗法	俞兆鹏(404)
欧阳修教育思想探析	刘光亮(417)
欧阳修与陶渊明的文化传承关系	王水根(431)
欧阳修与蔡襄的交谊	吴以宁(438)
欧阳修在滁州	萧世民(450)
简述欧阳氏家族的发展史	欧阳勇(462)
欧阳修与永丰	徐荣晖(468)
后记	(475)

易学、理学和欧阳修的史学

吴怀祺

欧阳修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也是开风气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深入研究欧阳修在每一个领域的成就，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思考欧阳修的学术与学风的特征；也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欧阳修的学术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欧阳修在每一个领域内学术上的特色。

欧阳修的史学与他的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他的理学又是和他的易学见解相联结。可以说，欧阳修的易学是他的理学的基础，而他的理学又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哲理基础。因此，把欧阳修的易学、理学与史学联结在一起思考，才能更好地认识庐陵史学的特点。

欧阳修的理学与易学

宋代理学始于三先生，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三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欧阳修在宋代理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全祖望在《庆历五先生书院记》中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唯阳城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

胡氏在吴，相互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①

欧阳修作为濂洛前茅之一，他的对理学发生发展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说明。

首先，他勇于疑经，张起疑古辨伪的旗帜，为经学的变化、理学的兴起，廓清了道路。宋人学术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发生一大变化，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疑古辨伪思潮的出现。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②随着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随着变化。旧有的意识形态为适应新的形势，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更新，疑古辨伪是旧的突破，也是新的意识形态产生的前提与条件。欧阳修在宋人的疑古辨伪中是开风气的人物，他自称自己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说：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与修同其说也？^③

在笃信经传中的中国中古时期，欧阳修敢于力排旧说，对传统